

【唐代文学专题研究】

DOI:10.13467/j.cnki.jbuss.2018.02.09

谈谈《全唐文纪事》的研究、整理与利用^{*}

赵阳阳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全唐文纪事》作为唐文研究的重要资料,目前仅有断句整理本,且未详注文献出处,文字也存在不少讹误。因此,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书进行深入的整理,以发挥其功用,尤为必要。此书既往研究、当下整理之思路、如何利用此书等三个方面,尤当须探讨。

[关键词]《全唐文纪事》;研究;整理;利用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193(2018)02-056-04

《全唐文纪事》凡120卷,是清代嘉庆年间学者陈鸿墀(1775—1837)在纂辑《全唐文》时,从前代文献中辑录有关唐文之各种文献而成。所搜罗的材料,除正史传记外,旁及野史、笔记小说、考证文字,以及金石学、目录学著作等。因此,作为唐文研究的资料,这部书有其重要用途。然而,此书目前仅有断句本,且文献出处仅及书名,未及卷数,且由于原书刊行于作者身后,文字也有不少讹误。因此,对此书进行深入的整理,以发挥其功用,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料书,是很有必要的。以下从此书之既有研究、当下整理之思路、如何利用此书三个方面,略做讨论。

一、《全唐文纪事》既有之研究

前人对此书的研究可约略分为三个方面:

一为总体论述、评价《全唐文纪事》。陈鸿墀门生陈澧在此书序言中说:“窃念先生奉诏纂成巨裘,以余力为此书,而犹浩博如此。”^{[1](P1)}民国学者刘启瑞为同治十二年(1873)巴陵方氏刻本《全唐文纪事》撰写提要,云此书“仿计有功《唐诗纪事》法也……此编本之立名,遂并兼用其例,搜采之博,抉择之当,迨有过之。世之考唐人诗文者,当与计有功《唐诗纪事》同珍矣。”^{[2](P434)}民国31年(1942),邓之诚先生阅览此书,谓其“分目八十,

间有出入,不甚愜当处。然体大思精,取材极博,殊不易及。”^{[3](P141)}虽对其分类有所不满,但对此书的搜罗之广、用力之深,评价极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全唐文纪事·出版说明》综合前人意见,云:“虽然由于编纂者采取述而不作的态度,只是广泛搜集原始材料,并未经过提炼取舍,以致内容方面精粗杂陈,并非全部都有资料价值,但对于研究者说来,却未尝不可以由此领略唐代文章的精神风貌,对于主要作家的思想和文采,都可以略窥涯涘,进而深入研究,也较易为力。”^{[1](P2)}黄永年先生《唐史史料学》也认为此书“能把唐文及作者有关的资料搜辑到一起,便于观览,确系做了一件大好事”^{[4](P253)}。以上论述皆重在表彰此书作为唐文研究资料渊薮的文献价值。

一为《全唐文纪事》之刊行、流传,以及点校整理、文字订正的研究。寻霖、刘志盛《湖南刻书史略》(岳麓书社2013年)之“巴陵方氏碧琳琅馆藏书与刻书”就方功惠刻书进行考察,其中略及方氏所刻《全唐文纪事》一事。郑伟章《方功惠碧琳琅馆藏书刻书考》(《求索》1989年第1期)、黄琬淇《方功惠及碧琳琅馆研究》(台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等文,则主要关注方功惠及其藏书、刻书,偶及《全唐文纪事》的刊刻。1959年,中华书

* [收稿日期]2017-10-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全唐文纪事》校证与研究(项目编号:16CZW020)。

[作者简介]赵阳阳(1983-),男,河南偃师人,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文献学、版本目录学。

局上海编辑所曾据方功惠刻本,将此书断句(未施标点)排印出版,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在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断句本基础上,改正了一些标点和排印错误,重新出版,其《出版说明》称方功惠刻本《全唐文纪事》“字体虽大而悦目,但校勘不精,鲁鱼亥豕,触目皆是”,并称“这次重印,凡是书中征引到的文字有原书可资核对的,我们都尽可能找出原书,作了校勘”。^{[1](P2)}然而,仅据张静《〈全唐文纪事·贡举卷〉校勘举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1期)一文对《全唐文纪事·贡举卷》在征引材料时出现的问题进行的考证,得知“贡举”部分凡收录105条材料,其中35条与原文存在或多或少的出入。一则可见,陈鸿墀在抄录文献时多有手民之误,且此书刊刻时“几阅月而毕”(《全唐文纪事》陈澧序),难免讹误之发生;二则可见,出版社在整理此书时并未如其所云“找出原书,作了校勘”。这也说明此书亟须校勘、整理,以为学界采用。

一为《全唐文纪事》作者陈鸿墀生平及与修《全唐文》经过的考证。有鉴于《全唐文纪事》史料价值之巨大,前人对其编者陈鸿墀的生平早欲考求,《邓之诚文史札记》载:“鸿墀嘉庆中修《全唐文》,为总纂,此书所引,皆注出处,间有考订,亦颇精审,唯不识其生平,暇当考之。”^{[3](P141)}陈尚君《述〈全唐文〉成书经过》一文的“《全唐文》的主要修撰者”部分对陈鸿墀生平有简略介绍,侧重考查陈氏与修《全唐文》时期的行迹。陈文谓“陈鸿墀《全唐文纪事》首列引书目五百八十一一种,其中虽有相当部分为其晚年增订时所补,但大多应为编修时曾检之书。”^{[5](P192)}然限于文章主旨,并未对此一问题展开论述。实际上,若对《全唐文纪事》引书与《全唐文》用书做比较研究,则有利于确考《全唐文》用书之具体情况。夏婧《清编〈全唐文〉研究》(复旦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之“《全唐文》编校人员再考察”部分,在乃师陈尚君的基础上对陈鸿墀生平续有补充,然亦有未尽之处。

目前,质量较高的两部文学辞典——钱仲联、傅璇琮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与钱仲联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中华书局1996年),于陈鸿墀生卒年皆云不详,实际上,据陈鸿墀《抱箫山道人遗稿》中陈鸿墀自作诗文及其子陈宗亲所作跋语,可确定陈鸿墀生于1775年,卒于1837年。此外,两部词典对于陈鸿墀中进士前之行踪,以及此后主宝

晋书院、越华书院、官内阁中书等事,皆未能详考。笔者近撰《陈鸿墀年谱》,已积稿万余字,希望不久能付之畛闾,供读者批评。

二、《全唐文纪事》整理之思路

《全唐文纪事》一方面作为辑录唐文资料浩博的体大思精之作,一方面又多有讹误,且未明确注明所出卷次,对于学界充分利用此书十分不利。因此,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此书进行深入整理,便是极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一)为《全唐文纪事》注明所出与卷次,方便学者利用此书,发挥其最大的文献价值。黄永年《唐史史料学》认为,此书“所引用之书只注书名,不注卷次,如《册府元龟》有一千卷,不注卷次要查核全书就颇困难”^{[4](P253)},所云极为中肯。鉴于此,整理此书,应首先收集《全唐文纪事》引书之最佳版本,进而为其所引材料注明出处与卷次。《全唐文纪事》引书凡576种,其中半数以上有今人精校本,这些整理本为《全唐文纪事》引文核校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这一核校工作还能解决不少《全唐文纪事》在引用文献时的不规范之处,如《全唐文纪事》卷二十七引《校定杜工部集》跋文^{[1](P259)},仅注明出自《东观余论》,很容易让人误认为黄伯思所跋,实际上,此文为《东观余论》书末之附录,作者为李纲,全名为《太傅大丞相李公序校定杜工部集》。

(二)利用史源学的方法,对《全唐文纪事》引录文献与刊刻时出现的讹误进行深入的发掘,校订此书的讹误,同时订正上海古籍出版社断句本之句读错误。如卷十四“显庆四年春二月乙亥”条引《旧唐书·高宗纪》误“郭待封”为“郭侍封”,“上御勤政楼”条引《旧唐书·玄宗纪》误“天宝十三载”为“天宝十二载”,“《册府元龟》唐天宝十载九月辛卯”条引《日知录》误“崔慎感”为“崔慎惑”等等,皆可据原书善本进行厘正。^{[6](P77-84)}

另外,排印本的断句错误,也予以订正,如卷九十一引《古器辨》云:“丙爵丁爵鉴二甲。其文曰……”^{[1](P114)},实际上应断作:“丙,爵。丁,爵。鉴二:甲,其文曰……”,等等。

(三)编制索引,发挥此书在唐代文史研究中的最大价值。此书虽注出处,然仅交代书名,且往往有误,又没有具体到卷数,甚至有些条目仅标明作者和篇名,未言其所据书名(如卷十四引及《全唐文》处皆如此),因于篇幅较大的图籍,核校利用颇为不便。黄永年《唐史史料学》认为整理此书,

“应做一个索引,以唐文原作者为条目,把此书有关作者的材料的卷次条数开列其下,即可补救此书的这个缺点。”^{[4](P253)}有鉴于此,可编制《唐文作者索引》《唐文篇目索引》,从不同角度满足文史研究者的需要。

(四)从文献学层面,对陈鸿墀与其《全唐文纪事》进行全面研究,考察其生平仕宦、学术历程,表彰他在唐文考辨方面的重要贡献,对《全唐文纪事》之成书、体例、流传进行深入考察,并深入考察《全唐文纪事》引书版本,力求为整理清编《全唐文》提供借鉴。

总之,通过对《全唐文纪事》所引据材料的新复核,校订方功惠刻本文字的讹误(包括陈鸿墀抄录的讹误),为学界提供一个经过精心校订的《全唐文纪事》文本;进而在这一文本基础上,编纂《作者索引》《篇目索引》,以方便学者使用;最后,在校证的基础上就陈鸿墀之唐文考辨成绩、《全唐文纪事》之用书等课题撰写研究论文,形成《全唐文纪事》及其编者陈鸿墀的研究成果。等将来条件成熟时,可在原引据五百多种书之外,尽可能全面地搜罗唐文有关史料,丰富唐文纪事材料,然后依照计有功《唐诗纪事》“以人系诗,以诗系事”的体例,重加编纂形成一部具有时代学术水准的《唐文纪事》。

三、《全唐文纪事》之利用

晚清学者郭嵩焘见到王逸梧编次的《魏文贞故事拾遗》,曾据《全唐文纪事》增入十余条材料^{[7](P574)};傅璇琮先生在撰作《李德裕年谱》与进行翰林学士研究时,亦颇重视对此书的利用。可见,前贤对此书的利用,主要是将其视为资料渊藪看待的。然而综观学界,利用《全唐文纪事》时,往往心存疑虑,以为其出处不明,一也;以为其文字脱讹,二也。然而,如若对此书进行深度的校订整理,则不惟对于唐文的研究,甚至对于唐代文学的研究,都会大有裨益。

首先,具备详明出处的《全唐文纪事》,可被学者放心加以引用,且因其相关唐文资料汇聚一处,互相比较,往往会有启迪人处。辅以相应的人名、篇名索引,欲检讨同一作家之不同作品的载录、评价情况,皆可轻易获取,提高蒐集材料的效率。

其次,重新发现《全唐文纪事》的校勘价值。前人在肯定此书把所有资料汇集一处,节省研究者翻检之劳的同时,多认为此书所征引的文献“无佚字秘笈”(《唐史史料学》)、“都是人所常见,无甚

特殊”(《全唐文纪事·出版前言》)。实际上,《全唐文纪事》也往往有可补订今存典籍者。即就习见文献而言,《全唐文纪事》编纂时所据之版本,与今本亦有差异。如《唐会要》今习见之版本,有清嘉庆年间武英殿聚珍本(木活字排印本,中华书局1955年据以影印行世)。然而在殿本之前,此书久凭传抄流传,脱误颇多,异本异文所在多有。嘉庆年间陈鸿墀与修《全唐文》时,所用《唐会要》理应为《四库全书》本或《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然而,考校《全唐文纪事》所引《唐会要》文字,偶有意外之收获。如武英殿本《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在唐穆宗“复试郑朗等诏”云:

长庆元年敕:“今年礼部侍郎钱徽下进士郑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重试。”覆落十三人。三月丁未,诏:“国家设文学之科,本求实才,苟容侥幸,则异至公。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扰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眷言败俗,深用兴怀。郑朗等昨令重试,乃求深僻题目,贵观学艺浅深。孤竹管是祭天之乐,出于《周礼》正经,阅其呈试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辞律鄙浅,芜累至多。其温业等三人粗通,可与及第,其余落下。今后礼部举人,宜准开元二十五年勅,及第人所试杂文,先送中书门下详覆。侍郎钱徽贬江州刺史。”^{[8](卷七六2b-3b)}

而《全唐文纪事》卷一四所引作:

长庆元年敕:“今年礼部侍郎钱徽下进士郑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重试。”覆落十三人。三月丁未,诏曰:“国家设文学之科,本求实才,苟容侥幸,则异至公。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扰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眷言败俗,深用兴怀。郑朗等昨令重试,意在精核艺能,不于异书之中,固求深僻题目。贵令所试成就,以观学艺浅深。孤竹管是祭天之乐,出于《周礼》正经,阅其呈试之文,似不知本事,辞律鄙浅,芜累亦多。比令宣示钱徽,庶其深自怀愧,诚宜尽弃,以警将来。但以四海无虞,人心方泰,用弘宽假,式示殊恩,特掩瑕瑕,庶明予志。孔温业、赵存约、窦洵直所试粗通,与及第。卢公亮等十人并落下,钱徽从别勅处分。自今已后,礼部举人,宜准开元二十五年勅,及第讫,所试杂文

并策,送中书门下详覆。侍郎钱徽贬江州刺史。”^{[1](P176-177)}

两相比勘,则《全唐文纪事》所引文字较武英殿本《会要》多出近五十字。且所涉人名亦有不同,武英殿本《唐会要》之“郑郎”,《全唐文纪事》引《唐会要》作“郑朗”,武英殿本《唐会要》之“温业”,《全唐文纪事》引《唐会要》作“孔温业”。考《旧唐书·穆宗纪》《册府元龟》卷六五一等,当以《全唐文纪事》所载之“郑朗”为是;复考《旧唐书·穆宗纪》《册府元龟》卷六四〇等,当以《全唐文纪事》所载之“孔温业”为是。另外,《全唐文纪事》所引较通行本多出的文字,与《册府元龟》卷六四〇所载“穆宗长庆元年三月敕”相近,不知究竟是《全唐文纪事》所据《唐会要》原本如此,抑或曾据《册府元龟》增补。要之,《全唐文纪事》所据《唐会要》与通行本文字多有不同,其版本也较今通行者为佳。似陈鸿墀与修《全唐文》时所据《唐会要》并非《四库》本,亦非武英殿本,当别有所据。因此,《全唐文纪事》所据《唐会要》便可作为当下整理《唐会要》的重要参考。另《全唐文纪事》引及《唐大诏令集》处多有人名差异,《纪事》所引往往与《登科记考》所引暗合,则陈鸿墀与徐松当年在文颖馆与修《全唐文》时所见之《唐大诏令集》与今本当有较大差异,这些异文可为当下整理《唐大诏令集》提供参考。可见,《全唐文纪事》中所引诸书,虽大多习见,但毕竟尚有不少稀见文献,故其实际上也略具保存资料之价值与功用。

再次,《全唐文纪事》之陈鸿墀按语价值很高,可据以估定陈鸿墀之具体考证成绩。兹举一例为证。《全唐文纪事》卷四“帝制一”第六则引《金石萃编》云:“太宗《赐孙真人颂》及孙思邈《福寿论碑》,皆元人杨聪书。盖真人孙思邈隐居地有太玄洞,或云真人疗龙处,下有聚虎坪,即真人伏虎处。

此太宗赐颂所云降龙伏虎者也。”下有陈鸿墀按语云:“《唐书·孙思邈传》未尝载有太宗赐颂之事,此所刻颂语有可疑者。如曰‘羽翼三圣’,不知其何指。思邈生于周,长于隋,入唐则历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在隋文时虽召以官,不得言羽翼,且太宗亦不得称隋文为圣。在唐三朝,太宗是第二世,安得遂有三圣之称。明系后人颂思邈之辞,而谓其经历三朝也。又唐世讳虎字,太宗不得直用降龙伏虎字,尤为明证。《唐书》传列思邈于隐逸,未尝以真人目之,至《道藏》载其书始冠以‘孙真人’之号,真人之封始于宋,则太宗赐颂,必宋时道流伪托也。”^{[1](P43)}所考极为精彩,可为定讞。然而,当代学者仍不乏将《赐孙真人颂》当成唐太宗真作,借以论证孙思邈在当时所受之礼遇。

此外,通过对《全唐文纪事》之用书状况的考察,也可借以窥测《全唐文》编修过程中对于旧有图籍的利用状况,对《全唐文》之成书研究也可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 陈鸿墀. 全唐文纪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2]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济南:齐鲁书社,1996.
- [3] 邓之诚. 邓之诚文史札记[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 [4] 黄永年. 唐史史料学[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 [5] 陈尚君. 陈尚君自选集[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6] 张静. 《全唐文纪事·贡举卷》校勘举证[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01):76-84.
- [7] 郭嵩焘. 郭嵩焘全集[M]. 长沙:岳麓书社,2012.
- [8] 王溥. 唐会要[M]. 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责任编辑 张福安)

Study on the Research, Coll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QuanTangWenJiShi

ZHAO Yang-yang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Shaanxi)

Abstract: QuanTangWen JiShi is an important material of the study of Tang Dynasty writings, but there is only a simple collation version about this book, meanwhile, it did not specify the source of the literature and had many mistakes on characters. Therefore, to do further research is necessary.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past research, and studies how to do further research and how to use this book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QuanTangWen JiShi; research; collation; utilization